

21.20

会东文史资料



第

一

辑

政协会东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9 部 解 卷

PDG

目 录

前言	(1)
红军长征途经会东县境大事记	肖松生等 (3)
林万夫给会东县党史办的复信	林万夫 (5)
西康人民军金江游击队第一支队	
始末	中共会东县委党史办 (7)
参加金江游击一支队的战斗经历	胥尚清 (31)
金江支队战斗生活片断	董永福 (43)
回忆我们的爸爸胥印侯	胥尚巽口述, 王若夫整理 (50)
者堡土司的没落	邓翰貽 (63)
苏、龙械斗记略	安德万等口述, 赵世洁整理 (82)
会理东区剿匪与周若梦镇反违纪	张国树、赵世洁 (89)
姜州剿匪亲历记	冯震坤口述, 赵世洁整理 (99)
在匪群包围中战斗	周培益, 赵世洁整理 (103)
清剿曾银海股匪纪实	伍康 (107)
巧除赵润业股匪	赵心洁等口述, 赵世洁整理 (109)
野租区平叛纪实	李凯恩 (113)
会东县最后一股土匪是怎样肃清的	邓貽翰 (126)
在匪患声中兴学	陈国治 (139)

前 言

文史资料工作，是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总理交给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在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不仅为历史科学积累了珍贵的史料，而且对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以及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提出：“以史为鉴，以文会友，振兴中华，共同奋斗”。对文史资料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更是一个生动的概括和有力的推动。

我县文史资料的收集审编工作，在县委、政协领导和政协委员、各方人士的关心、支持下，经过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诸同志的积极努力，最近两届征集了不少稿件，经过协同作者增删修改，已陆续不定期地印发了《会东文史资料》二十期，现从这些打印的资料中，选择较有价值、有影响的稿件，编辑出版了这册《会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作为会东建县四十周年的献礼。

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是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文史资料工作的指导方针。今后，我们将在收集、整理、撰写、审编过程中，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清除“左”的影响，放手征集，广征博采，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我们热忱欢迎广大党政干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踊跃撰写和提供文

史资料稿件、图片，特别欢迎历史当事人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文稿不限体裁、不求完整、不计长短，但必须真实。

在本《选辑》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领导和同志们热情支持和帮助，特致谢意。由于审编的水平，粗疏讹误在所难免，有关史料，敬望读者批评、补充、订正。我们殷切期望在读者、作者的帮助下不断改进。

政协东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于一九九一年九月

红军长征途经会东县境

大事记

一九三三年十月，红军突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进入云南、贵州、西康、四川等省边界地区。

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至八日，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至三月底，红一方面军往来驰骋于黔北、川南和云南的乌蒙地区，佯攻贵阳，威逼昆明；乘敌军晕头转向，指挥失措之际，于五月上旬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中央军委纵队、一、三、五、九军团于五月三日晚至九日分别在会理县绞平渡、会东县河门口、鱼坝滩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境内，甩掉了国民党数十万追兵的围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经沾益、寻甸至禄劝，兵分两路向金沙江急进，军委纵队干部团抢占绞平渡，奔袭通安，为红军渡金沙江开辟了道路。

农历五月三日下午，三军团由禄劝县大松树抢占会东县可河乡河门渡，五军团为后卫，三军团战士十余人武装泅渡，击溃江边堵截团丁，夺得小船一只，征集船工杨朝兴等后，又获得小船三只，在船工的帮助下，经过三天三夜抢渡，顺利过江。

五月四日随即占领可河街，攻破团头康练伯，伪区长王

连三家，再攻占铁匠村，此后分路到会理（一路经蒿枝坝梁子、姜州、小坝、坛罐窑至会理；一路经长冲、富乐至会理）。

五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在会理休整，五月十六日晚向德昌、西昌前进。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红九军团由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率领，攻占云南沾益、宣威、东川、巧家等县至树桔渡口，在船工饶顺清、饶顺彪等帮助下，于五月四日凌晨将漏船一只修好立即组织渡江，先渡江的八名战士自鱼坝滩奔袭盐井，俘获官房亲丁及师爷，夺得封禁在麻塘湾的木船十八只，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渡全部顺利渡过江后，将所有船只击毁沉没，甩掉了国民党追军。自鱼坝滩渡河后分为三路前进：一路沿汪家坪、新开田、岩坝至黄坪乡的冬瓜坪；一路经小米地、沙坪子至冬瓜坪；一路乘船经甘盐井至吉兆卡。

五月八日凌晨，与国民党堵截队伍24军28团遭遇，经两小时激战，全歼敌军一连，击溃一连，击毙敌连长李××，缴获82迫击炮一门，枪弹若干。此后即向塘坊进发，另一路经甘盐井、吉兆卡至小街塘坊与上述两路会合。

五月九日，至红果休整一天两夜并扩军，会东林万夫等三十余名青年参加了红军。

五月十一日，分两路向宁南挺进。

五月十二日，进入普格。

五月二十日，到达泸沽与红一方面军主力汇合北上。

附：有关人员的回忆。（一九八五～八六年收集整理）。

林万夫给会东县党史办的复信

会东县党史办：

一、红军路过红果的时间。红军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七日（旧历）下午约5点钟左右到达大村的，经过大村的红军部队是从大村后山下下来的，一些部队往北去了，一些部队住在大村，在大村的部队是军团部及直属队，他们在大村住了两夜一天，于九日早上经火山（过去叫小火山）北去了。到红果的部队可能是四月七日下午，到新街的部队可能是四月七天天黑时到达的。

二、路过红果的红军是一方面军，路过红果、新街一带的是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据说当时下属八、九两个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松藩、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其下属各领导人，绝大多数未见过（当时都以连为单位集合），见过的也回忆不起来了。红军的部队，除了真番号外未听说有别的代号。

三、我参军的地方在大村北三、四十里外（当时未问地名）。我四月十日下午沿着红军进行的路线，翻过火山后进入一条谷地森林小路，沿着这条小路北去赶红军，于当天下午二、三点钟时在一个沟坡上碰到红军九军团三营八连的一个哨所，他们经过盘问后把我带到该连的住地（不知村名，当时也未问是什么地方）将我分到三排九班充战士。至于你们来信中提到的几个人，我无印象，林国清是一个，我也记不得，另外还有谁参加了红军，我也不知道。

四、红军的宣传活动，由于地主的造谣，红军进村时，我们就跑到后山树林里去了，第二天上午我才回家，我家住了几个人，他们态度很好，说话和善，他们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当红军的都是穷苦的人，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为老百姓……，他们纪律严明，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用具有借有还，不侵犯群众利益，捆卧草、上门板，地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给群众的印象很好。其它标语口号，我没有注意，群众支持红军的情况，在我们这几家中，有我母亲踩碓舂米一天一夜，其它方面的支援我不清楚。

此致

敬礼

林万夫

1984年4月26日

（编者注：林万夫同志是会东县红果乡大村人，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过境时参军，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西康宁属人民军金江 一支队始末

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供稿

当解放战争正处于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共西昌工委遵循川康特委指示，把组织群众，发动武装起义的工作重点，由西昌、冕宁转移到会理。经过艰苦的开辟工作，在会理县东区（今会东县境部份地区）组建起西康宁属人民军金江一支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于大桥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并配合解放大军进军西昌，拔除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迎来了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

解放前的会理东区，既是当年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的过境地区，红军过境播下了革命火种；又是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滇桂黔边区游击纵队”（简称“边纵”）活动的毗邻地区，较易于动员群众，组织游击也有依托。一九四八年六月，龚成林、李逸、刘若愚（又名刘万龄）三同志在会理开会研究贯彻西昌工委的决定，首先在会理城区发展一批党员作为骨干，以东区和南区为重点发展地下武装。入秋以后，先后派刘若愚、温良实、兰培根到大桥，在叶剑明（又名蔡

異，一九三八年九月在延安抗大入党，一九四五年以前在四川江津一带活动，因组织“读书会”暴露后转移来西昌，找组织不遇，脱党。通过会理县长赵子博的关系，委派在大桥“田赋粮食管理处”任职。）处落脚，共同开辟东区工作。

一九四九年二月，叶剑明为征收田赋去巧家，在“庆康商号”结识了东区首富胥印侯（又名胥维绶，出身商兼地主，与龙云之子龙绳曾是联襟。本人精研中医，好学善思，群众关系较好。）了解到胥同巧家县地下党的同志有较多的接触，经常秘密传递、阅读《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进步书刊和《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党的文献，具有进步思想并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如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巧家地下党组织崇仁中学和新华一、二小等三校师生联合庆祝“五·四”二十七周年大会活动，引起了敌特注意。当胥印侯从来“庆康商号”抽鸦片烟的敌谍报组长岳建侯口里听到地下党员肖菲已暴露并将被捕的信息，立即找郑家奎（地下党员，当时任巧家县教育局局长）商量对策。由胥以给肖诊病为名，通知肖作好转移准备，同时，又向敌特散布肖患肺结核病，快不行了，以此麻痹敌人，争取时间。胥印侯还资助二饼洋纱（约折七十块钢洋），帮助肖菲转移脱险。再如：一九四九年三月底四月初，特务陆兴邦与巧家地霸陆邦培伙同一些地痞流氓组成一个篮球队，常借口练球，扰乱崇仁中学（巧家地下党掌握的学校）的教学秩序。一次，学生正上体育课时，该球队抢占了学校球场，引起全校师生极大愤怒，进步学生奋起反抗，双方争执中，打伤该球队成员万朝林，特务陆兴邦借机煽动这伙流氓与学校闹事。巧家地下党负责人杨春甫（又名杨霖）通过胥印侯向巧家伪

县府和向有关士绅讲明：这伙人多次到崇仁中学寻衅，这次并先出手打学生，引起全校师生义愤的情况。经胥多方疏通，并亲自给万医伤，做工作，才使事态未扩大，特务陆兴邦的阴谋未能得逞，地霸陆邦培也只好悄悄溜走，平息了一场风波。经过刘若愚、温良实、李逸等同志多次考察，根据本人申请于一九四九年四月，由温良实介绍，接收了胥印侯入党。在此期间，西昌技专校进步学生陈艾九、常怀（又名常业定）到康、滇边境找党的游击队，路过会理，经地下党员王凡夫介绍，来巧家“庆康商号”接头。在会理中学任教的周若梦也一道同来，通过郑家奎、陈大金（地下党员，当时任崇仁中学教务主任）的关系，将陈艾九、周若梦安排到崇仁中学教书，常怀则留在“庆康商号”，以家庭教师名义掩护革命活动。陈、周、常三位同志与胥印侯同时入党。叶剑明经温良实证明，也恢复了党籍。随着党的地下组织的发展，加上王瑛、席恰中等同志先后到了东区。为了适应工作需要，七月初，李逸主持建立了“东区特别支部”。席恰中任书记、胥印侯任副书记、王瑛任组织委员（这时，刘若愚已调冕宁，温良实调会理南区，兰培根调会理西北区工作。）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加快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进程。

二

一九四九年七月，东区特支以崇兴街为依托，积极开展工作。席恰中、陈艾九、吴兴泰、章润煌等同志经常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在大桥、江西街、木树笼（今新街、红果）、

范卓、堵格、故纳、高科等地在有觉悟的贫苦农民中组织积极分子，又在经过教育、考核的积极分子中，陆续发展了荷天瑞、薛其祥、万天顺、赵春荣、戴恩富、胥维祥、李正才、李仕富、凤太学等十一名党员。还在江西街开办了农民识字班，在江西（李仕富家）举办过三期骨干培训会，陈仕荣在新街利用当地的“齐心会”，杨天沛在江滨乡通过“月亮会”、“碗会”习俗活动，团结教育群众。与此同时，还遵照“利用矛盾，争取团结多数”的统一战线方针，团结、争取了与会理大恶霸苏少章有矛盾的地方势力。如：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滇军龙云部队任骑兵大队长，后在昆明接受民主思想，有革命要求，在会理东区、南区较有影响的魏叔祥，当他来到金沙江畔寻找革命游击队伍途中，住崇兴街上一家小旅店中，东区特支即派胥印侯去做工作，争取他参加金江支队。支队党委考虑到魏的特殊身份、地方影响、军事技能和作战经验，任命他为支队副司令员。他先后疏通了铁匠村的王继禄，通安的康云封、康伯衡等地方势力，为开展革命活动，发展武装力量，减少了许多阻力。又如：特支派章润煌、李明远（又名李祖杰）赴嘎吉、高科、保佐，利用苏少章同龙吉伟冤家械斗的尖锐矛盾，开辟了工作，在龙家严密控制下的高科一带组织秘密农会，组建地下武装；派周若梦以带队参加篮球赛去宁南，了解和发展宁南中学学生会主席刘家伦，进步学生戚晓东、李德芳。一九四九年九月初，刘、戚两人先后从宁南带着五十多人，二十多条枪来参加金江支队。特别是团结、争取碧木卡的彝族头人禄应举（又名禄应州，曾任保长，因他为人正直，多次带领当地农民反抗会理苏家拉丁派款，为苏少章所不容。经陈艾九同志住在禄家做

工作，帮助他弄懂什么是民族压迫，什么是阶级剥削，他毅然同当地彝、汉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起加入了党的地下武装，同年十月光荣入党。与此同时，在云南巧家，经特支研究，通过胥印侯介绍我地下党员陈艾九、吴兴泰打入龙绳曾部队，在内部掌握情况，配合做策反工作，吸引并培养一批进步青年，并在其中发展了姜康、王丽生、王剑明（女，原名王文武）、施光兴、李标等入党。这些同志后来均脱离龙部，参加了金江支队。

一九四九年八月底，党的东区特支的党员已发展了三十多人。到十二月中旬，以贫苦农民和彝族奴隶为主体的地下武装也发展近两千入。当党的地下武装组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的时候，龚成林、李逸来到崇兴街与席、王等在雀依坪开会，讨论决定：“东区起来，南区就动，西北区积极配合进军会理，会师攻城”的计划，并督促尽快“暴动”。李逸在巧家县城召集党员会议，决定将武装组织定名为“西康宁属人民军金江一支队”。在这段时间里，首先，建立支队党委，李逸任书记，席恰中任副书记，成员还有胥印侯、叶剑明、王瑛。以加强党的领导。支队党委从十月初开始，先在巧家县四川街张海泉家后院楼上，后转移到西门外陈正明家糖坊内秘密举办了三期党员骨干培训班，并安排这些党员骨干回去后，再以小集中的方式，分散短训，使党员和骨干都有思想准备。再是依照地区分布情况，编组部队，组建支队领导机构。整个支队共辖五个大队和一个直属中队。

一大队	大队长	万天顺
	教导员	杨天沛

二大队	大队长	禄应举（彝族）
	副大队长	陈继康（现名陈雨久）
	教导员	陈艾九
三大队	大队长	邓福金
	副大队长	杜方衡
	教导员	吴兴泰
四大队	大队长	陈仕荣
	教导员	周若梦
铁香大队	大队长	李明远
	副大队长	凤太学（彝族）
	教导员	章润煌
直属中队	中队长	刘升俊（后胥尚仁）
	副中队长	万天发（后关寿德）

上述二、四大队有三百左右彝族战士，约占两个大队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各中队分别任命了队长、指导员、政工员。政工干部由支队党委派共产党员担任。

支队领导机关设司令部和政治部，成员有：

司令员 胥印侯（署名胥为民）

副司令员 魏叔祥

政委 李逸（署名李文）

政治部主任 席恰中

参谋长 叶剑明（署名蔡巽）

秘书 王瑛

下设三科、一队，具体是：

组织科 科长 王瑛（兼）

供应科 科长 胡均衡

副科长 施光兴

军械科 科长 常怀

宣传队 负责人 王文武(女)、褚瑶璞(女)

三是为武装“暴动”进行必要的准备。缝制了一面长方形正中一颗金色五角星的大红旗，顺旗杆有“宁属人民军金江支队”金色大字作为支队军旗。刻制了“西康宁属人民军金江支队”的木质大印。制发了白底红色仿宋字体“宁属人民军金江支队”的胸章符号。翻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布告。草拟了《告宁属人民书》和标语、口号。四是从一九四九年七月起，胥印侯陆续变卖家产(除田地房屋外)和商号货物共约三万五千块钢洋充作军费，由胡均衡、李衡甫在昭通、宜宾等地购买枪弹和军需物品，为武装暴动作好物质准备。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同时通电宣布起义，极大地震动了盘据西昌的贺国光和溃退到宁属的胡宗南。他们妄图负隅顽抗，国民党西昌警备司令部派出一个加强连驻防洼乌(今华弹)，控制川滇交通的一个重要渡口。同时，西南反共自卫军金江中游守备司令苏少章也派出一个江防大队驻防鲁吉，控制鲁吉与巧家的交通咽喉，两支敌军形成上下夹击崇兴街(金江支队司令部所在地)的态势，且对云南“边纵”游击活动起了监视作用。金江支队委和司令部人员正在商讨对策，研究如何摆脱严重威胁的时候，地下党员邓福平来汇报：驻防洼乌的敌军与地头蛇丁恩儒摩擦、火并，敌军想拉地方势力邓福金(邓福平的

哥)相助等情况。李逸、席恰中、姜康等当晚沿金沙江赶到洼乌,同邓家兄弟商定,由邓福金出面邀请驻军排连头目赴筵,筵席中突然袭击,迫使全部缴械。可惜,大桥“暴动”的枪声,打破了这一计划。

三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农历冬月初一),伪大桥乡长唐光先(绰号唐二麻子)带狗腿子吴国顺、王太和到江西街李家大坪子李仕富家,强卖一支土造步枪(巧家土造仅值五十块钢洋),索价一百二十块钢洋。当时,李心想:“反正游击队正需要枪”,就照高价付款,不料唐光先收了钱不给枪,反口说:“是收的江防捐”。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忿而叫人把狗腿子痛打一顿并缴了他们的枪,把两个狗腿子关押起来。这件事激怒了当地群众,地下武装和部份群众蜂起包围了保长郑兴虎、乡长唐光先的家。郑见势不妙,向群众缴枪投降,唐则仗势深院高墙,指挥护院家丁顽抗,双方僵持不下。地下交通薛其祥星夜赶到雀依坪向支队党委报告了情况,支队党委先决定通知李仕富立即撤下人枪,用“私人纠纷”暂时缓和下来,以利照已订计划“暴动”。但这时,群众情绪激昂,颇难劝阻;大桥、江西街一带的地下武装也自动集中人枪;伪乡长唐光先又化装逃往会理向苏少章报信去了。支队党委审时度势后,又决定放弃先取洼乌的计划,提前暴动,指挥部队进军大桥。对驻在鲁吉、洼乌的敌军,由杨天沛等负责严密监视。十二月二十五日(农历冬月初六)万天顺率领一大队人枪星夜奔袭大桥,李逸、席恰

中随军行动，就近指挥。二十六日（农历冬月初七）拂晓，对大桥守敌发起猛烈进攻，攻占了乡公所，横扫大桥、江西街至新街一带的伪政权，攻下了唐光先在三家村的老巢，俘虏护院兵丁近百人，缴枪五十余支，抄出的粮食、布匹和大量红糖，全部分给贫苦群众，一时，“红军又回来打土豪啰！”的声音传遍四乡。

大桥暴动，拉开了金江支队武装游击的序幕。十二月二十七日（农历冬月初八）支队司令部命令在高科的李明远率所部铁香大队宣布暴动，配合行动；派吴兴泰、王定楷（又名王明江）去海家村（现属岔河乡）组织彝、汉农民武装，扩大游击队伍；派周若梦、陈艾九分赴放马坪、太平场宣传群众，扩大影响。

大桥暴动，震慑了国民党驻洼乌的保安大队，他们闻讯后就连夜逃窜宁南；苏少章部驻鲁吉的江防大队更是闻风丧胆，也准备兼程逃回会理。他们的行动通过内线及时反映到支队司令部，经过研究，选择在石堰口进行伏击。十二月三十一日（农历冬月十二）支队政委李逸、参谋长蔡巽、政治部主任席恰中率领一、三、四大队五百余人枪，赶到石堰口，利用地形，埋伏待敌。同时，又命令二大队队长禄应举率部把守紧风口，不让敌人脱逃。十二月三十日夜从鲁吉出发的敌军经包谷山、小米地绕道插大坝过河爬山，由老庙子、杜家大坪子于一九五〇年元旦（农历冬月十三）中午，来到石堰口，进入游击队所设伏击圈，游击队居高临下，突然猛攻，敌军仓促应战，一片混乱，在不到三小时就全歼敌军，活捉敌江防大队副大队长张希龄、中队长周大友、刘书勋等十二人，生俘士兵百余人、击毙二十余人，缴获轻机枪四